

# “阿拉伯之春”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及其启示

陈文胜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在世界掀起的政治风暴至今余威犹存。关于这场运动的发起原因和影响的讨论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联结和动员功能,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和行动逻辑,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由青年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频仍发生,严重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因而,认真汲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积极拓展青年诉求表达的合理渠道,引导其有序参与,对于防范和消弭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风险,实现国家善政良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7)01-0110-08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与社交媒体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阿拉伯之春”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中,北非和中东青年曾借助社交媒体成为这场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主力。“‘阿拉伯之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青年运动,了解该地区的青年是理解这场社会运动开展的关键。”<sup>[1]</sup>而社交媒体则“从一个新的维度,创建了一个青年、社会运动二者结合的交汇点。”<sup>[2]</sup>“在过去的10年中,虽然青年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独立、民族主义、左派运动等民族运动紧密相关,但愈发地与媒体技术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广泛使用新的通信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交媒体,在年轻人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sup>[3]</sup>尽管“阿拉伯之春”的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交媒体在这场青年参与的政治变革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极大地改变了这场运动发生逻辑和演进规律。如今,这场运动引起了众多学者、政府人员和其他人士对青年、社会运动和社交媒体三者内在逻辑联系的兴趣和关注。深入了解这场运动背后的青年和社交媒体因素,对于我们拓展青年研究视野,做好社交媒体时代我国的青年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不无借鉴意义。

## 一、“阿拉伯之春”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的原因

2010年,突尼斯的抗议活动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全球,接着引发了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运动。“这些席卷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庞大的和持续的剧烈变化,被描述为‘二十一世纪早期最重要

**[收稿日期]**2017-0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博问政’与党的建设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CDJ007。

**[作者简介]**陈文胜,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与传媒研究。

的转型’”。<sup>[4]</sup>其意义和影响被认为不亚于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阿拉伯之春”的发生缘起于一件看似偶发性的摊贩自焚事件，但“表象之下的真正原因则是由于对经济困难、贫困、失业、腐败而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sup>[5]</sup>也就是说，阿拉伯青年处境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成为这场政治变革发生的重要因素和强大推动力。

#### （一）蓬勃发展的社交网络媒体为青年社交媒体参与提供了技术平台和渠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各国纷纷见证了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在阿拉伯地区，随着各国电信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阿拉伯国家成为世界互联网最为发达和充满活力的地区之一。仅仅“从2005年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互联网接入人口从13%就增加到40%”。<sup>[6]</sup>例如，在突尼斯，1/4的人口拥有电脑。埃及的电脑用户也达到1000万用户。近年来，随着该地区智能手机和移动电话数量的剧增，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开始成指数增长。据统计，阿拉伯国家中超过90%的互联网用户使用各种社交媒体网站，规模十分庞大。例如，在埃及，Facebook是继谷歌和雅虎之后第三个访问量最大的网站。2012年11月，埃及就有接近1200万的Facebook用户。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阿拉伯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参与的综合信息平台，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阿拉伯人封闭、崇古、尊权等传统思想文化观念。

事实上，“阿拉伯地区中有较高社交媒体使用率的国家通常是社会和政治生活表达空间稀缺、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地方”。<sup>[7]</sup>在这些地区，国家控制和垄断着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资源。许多民众认为，通过公共媒体或政府控制的媒体讨论一些忌讳的问题，如无神论或性行为等，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但在网络空间则不会发生这类危险了。并且，新型的社交媒体工具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政治、文化观点，来进行正式的政治参与或民间社会活动参与。而在参与人群中，“年轻人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站”。<sup>[8]</sup>例如，在埃及，“言论自由和集会的限制使Facebook成为埃及人，特别是年轻人，用于同他人自由沟通，组成团体反对穆巴拉克的极权主义政权和政府的首选工具”。<sup>[9]</sup>据统计，当时15岁至29岁的青年人占阿拉伯地区Facebook用户的70%。尽管政府设法控制互联网，但却无法摧毁自组织的抗议者。

如今，“在世界各地，青年人正在接受言论自由的概念和意见表达权，并从各个方面努力寻找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sup>[10]</sup>社交媒体的诞生改变了政治信息获取和反馈模式，拓宽了阿拉伯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涵，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新的平台、理念和可行性路径。阿拉伯国家中的年轻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社交媒体技术，自然而然充当了“移动公民记者”，是用户生成内容的主要创造者，成为社会运动的关键角色。而且，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参与是一种“自由、非强制性的、包容的和有意义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公众参与”。<sup>[11]</sup>总之，“新媒体有潜力改变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并正在影响他们的思维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动员方式”，<sup>[12]</sup>为阿拉伯青年提供了一个非正式舞台，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甚至参与反专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阿拉伯各国政治运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 （二）腐败的政治生态和恶化的经济形势是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的体制性原因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27岁的街头商贩，由于抗议当地城管没收其推货车及售卖的水果与蔬菜而自焚。这一事件引起了突尼斯民众的关注和共鸣，尤其是激怒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失业或半失业青年。由于政府的腐败和经济发展缓慢导致了社会财富不均和贫困，他们长期以来对政府的积怨终于如火山般爆发。这场在突尼斯爆发的群众抗议和骚乱很快波及和蔓延到周边地区，如也门、埃及、利比亚、苏丹等。一系列阿拉伯国家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这些抗议导致了政权的更迭、政府改革和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并且其影响持续到今天。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由宗派主义和部族主义构成的特殊社会政治结构是其中重要的一点。阿拉伯地区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依靠着世俗的统治，其特点是集中管理和半正式经济活动（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这不仅容易导致家族政治、权力世袭、裙带关系，而且也容易导致当权者对其他部族、族裔、教派进行权力防范，缺乏信任感和认同，甚至任意地加以镇压、掠夺或杀害，在阻碍了民主和自由实现的同时，也催生了大规模的腐败和尖锐的族际对抗意识，为社会

的不满和冲突动荡埋下祸根。另外,集中式独裁的封闭经济(如埃及、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也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另一个重要诱因。这些国家中大量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许多统治精英对国家财富无限制地控制,而社会普遍贫困,这使民众丧失了对信任感,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危机。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囤积了数百亿美元的巨大个人财富,而支付给本国公民的最低工资每月则不超过150美元。到了21世纪之交,这些国家的“有产者”和“无产者”经济收入差距之大开始变得史无前例。“在许多中东国家,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介于15%和20%之间,而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些数字。”<sup>[13]</sup>同时,全球放松管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容易遭受恶性的全球竞争。国外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流入,加上在全球自由化中,这些国家精英阶层的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脆弱性也愈发暴露无遗。甚至在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利比亚等国,其经济状况也持续恶化。因而,独裁腐败的政局和不断恶化的经济,成为沮丧和愤怒的阿拉伯青年要求改变现存政权的主要驱动力,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 (三) 强烈的被剥夺感和权利意识觉醒是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的主要思想诱因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作为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拉伯青年,不仅渴望融入社会,享有平等的待遇和就业机会,也同样渴求自由、政治变革和政治社会化,从而实现政治习得和政治参与。而专制的政治体制和糟糕的经济,尤其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阿拉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相对剥夺感愈发强烈,尤其是当地教派、部落和青年团体。例如,世纪之交的埃及有8000万人口,33%是14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其中,识字率超过71%。<sup>[14]</sup>事实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拥有渴望变革的动机。教育的广泛建立,尤其是大量职业阶层的出现,这也是民主建立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这些大量的受过新型教育的年轻一代,当面临着的是严峻的经济环境、大面积的政府腐败、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和职业岗位的缺乏时,其对时局进行变革的愿望和激情便可想而知。

在众多青年人所遭遇的问题中,最为尖锐的是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时,中东和北非青年失业率高达25%左右,成为世界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如埃及25%,也门35%,巴林20%,而突尼斯30%的青年处于失业状态。<sup>[15]</sup>高失业率、晚婚、贫困,以及延迟性行为等青年异化现象加剧了青年群体被剥夺感。尤其是在政治上,这些青年群体被视为“危险的”和“叛逆的”对象,被严密地防范和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有研究者指出:“失业率有助于青年政治参与”,而“生活的不满增加抗议的潜力”。<sup>[16]</sup>因而,在经济极度匮乏、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阿拉伯青年打出“面包、自由、尊严和社会公正”这些具有强烈生存诉求和政治诉求的革命口号。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街头抗议,通过社交媒体,通过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以新的方式在政治上建构自己。

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在通信领域、社会网络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阿拉伯各国政权开始丧失对信息的垄断权。很多青年人开始意识到,政府不仅否认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严密控制,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投入。更多的阿拉伯青年开始“了解周边世界和其他社会,并且能够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甚至是老一辈的失望和对苦难的坚忍,开始渴望自由、民主,以及周边的一切改革。他们寻求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个人的尊严和尊重”。<sup>[17]</sup>因而,他们开始依靠同质化的网络群组来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事实上,网络化的交往,进一步拓展了公共领域的空间,搭建了青年群体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广阔平台,为阿拉伯青年权利意识的勃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青年人使用他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数字技能和做法,来扩大他们政治活动”和“扩大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影响”。<sup>[18]</sup>

### (四)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介入推动是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的外部环境因素

阿拉伯国家青年社交媒体的参与也是与其周边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紧密相关的。从国际原因来看,西方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一直“矢志不渝”地推进中东自由。特别是自“9·11”以来,它们更是集中精力实施促进阿拉伯世界青年国内参与计划。通常,青年公民参与是从广义上进行定义的,包括正式的政治参与(如投票),以及更多公民活动(如参与社会运动)。为了实施阿拉伯世界多样性和参与促进计划,美国政府通过中东伙伴关系计划(MEPI),向阿拉伯世界450个大、小型组织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捐款。欧盟也通过其“青年行动”计划为阿拉伯世界提供若干项目,这些项目特别强调青年人的参与。此外,英国政府通过“阿拉伯伙伴关系”计划,资助了一些公民参与项目,其中几个项目



特别阐明了对青年参与的关注。例如,在黎巴嫩,西方国家资助了公民和教育共生战略(2012—2015年)、阿尔及利亚青年就业能力和公众声音项目、摩洛哥青年影子政府,以及巴勒斯坦地方青年理事会。2012年,开发计划署(UNDP)在阿拉伯地区实施一系列项目来促进青年国内政治参与。如在也门支持建立一个公共监督组织来负责监测青年权利;在约旦,开发关于地方治理的计算机互动游戏,促进青年参与索马里的地方理事会,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以青年为主导的公共监督项目。当然,这些旨在促进青年参与的方案也曾受到诟病,因为其被认为促进了当地“非政治化”的公民,而不是语境赋予的权利公民。然而,丝黛海利和纳格尔在研究黎巴嫩青年项目时认为,青年人使用从这些项目中学到的技能并不是有意为之。例如,青年进行的公民婚姻运动。这表明,治理公民的战略可以以无意的方式展开,不能低估组织、当地合作伙伴、政府和个人本身之间权力的能动性。<sup>[19]</sup>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的10年中,伴随着各种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相关的任务,阿拉伯国家青年团体和网络数量激增,并形成了一些以慈善和宗教为导向的青年团体。这些团体经常开展批评政府活动,揭露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它们通常会获得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如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自由之家(FH)、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等。因而,一些阿拉伯国家媒体指责其为“外来煽动者”。事实上,这些国外机构和组织经常通过一些手段来助推阿拉伯青年参与反政府活动。另外,美国政府也积极介入该地区,如有计划地训练青年骨干从事街头暴力活动;利用CNN、半岛电视台,尤其是“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来影响阿拉伯青年人的文化、话语和观念,充当“歪曲信息的急先锋”。一些盲目尊崇西方民主制的青年人,很容易在西方主流媒体舆论的诱导下,被煽动起来,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

## 二、“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推动

社交媒体能够通过互联网的信息共享、社区构建、形成新的集体行动路径,来提高民众的民主,增加政治参与。即“社交媒体能够为招募、筹款、传播信息和图形、集体讨论、行动动员提供强大的、快速的、低成本的工具”。<sup>[20]</sup>因而在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通常用来表达政治不满、批评政府、组织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即抗议和集会)、揭露政府的行为和表达政治变革理想。<sup>[21]</sup>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局限,促进了青年参与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成为运动背后的推手和催化剂。

### (一) 促进政治信息的多维和跨域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信息及信息传播是传媒影响政治的根本,“政治因为传播才成为政治”,这已成为政治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共识。而“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自身的传播就像1848年革命一样,完全是由于思想和信息的传播。这是一个受益于社交媒体使用的蔓延过程”。<sup>[22]</sup>在阿拉伯地区,由于“年轻人是数字高度连接的一代,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很容易获取良好的互联网使用技术知识”,<sup>[23]</sup>因而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传播思想和组织集体行动的重要政治传播媒介,他们成为运动的先锋。在阿拉伯地区,Facebook用户中,15岁至29岁的青年人占70%。如在埃及,78%的互联网用户小于34岁,在2010年时,城市中年轻的Facebook用户就达到500万。因而也有人称“社交媒体是城市青年的媒体”。<sup>[24]</sup>

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作为典型的社会性软件和互联网创新产品,在阿拉伯革命中不仅突破了话语权的垄断,拓展了舆论信息渠道,加速了信息的形成和扩散,使广大青年人获取信息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电视、广播和报纸,而是通过手机、网络等各种途径就能够获得关于运动开展的最新信息。另外,“社交媒体一直是信息共享的一个决定性的工具”,能够“帮助跨国界传播民主思想”。<sup>[25]</sup>当“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火焰被点燃后,埃及、突尼斯等国内生成的数字媒体报道的抗议行动,以及一系列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信息,开始突破传统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变得具有全球性,社交媒体成了革命蔓延的工具。

同时,社交媒体是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和发酵地,为舆论的形成和扩散提供了源泉。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通过对阿拉伯各国国内情况的及时报道,对推动社会舆论、加强群体价值认同、聚合政治目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正如本·H.贝戈蒂克安所论述的:“现代新闻、信息和流行文化体系绝不是技术发展的无关紧要的副产品,他们在影响舆论和制造社会合意。”<sup>[26]</sup>社交媒体为阿拉伯青年提供了放大舆论的平台,成为一部分革命的青年的“栖身”场所,为他们的政治诉求开通了新的渠道。而阿拉伯青年网上的交流、互动又酝酿了新的舆论,在各种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下,引起更多追求自由和民主

的青年人的关注和共鸣。尤其是当警察镇压和拘捕集会的群众的暴力和血腥画面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时,执政当局的行为不仅被为外界舆论所谴责和压制,而且也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甚至暴力抗议活动。

## (二) 促进集体行动和联结性行动, 构建强大的动力和组织机制

在西方心理学领域,大量的研究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将集体行动的形成归结为这样几个关键因素:集体认同、不公正的感受、效能信念、群体情绪。社交媒体正是通过建构集体行动,唤起政治化的集体认同,来帮助改变异样的声音和开放新的行为渠道,促进基于共同信念的不同群体一起工作以解决共同的不满。也就是说,社交媒体是“一种有效的集体行动的贡献者”,<sup>[27]</sup>能够促进“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实现并维持共同的和集体的政治话语和行动”,<sup>[28]</sup>成为传播抗议主张和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催化剂。在社交媒体的联结和推动下,分散的个体能快速成为集体意识的参与者,共同推动着交流沟通和群体性行为。可见,“社交媒体是一个能够赋予抗议者煽动和管理政治变革的潜力巨大的工具”。<sup>[29]</sup>

另外,社交媒体是一种门槛较低的民主互动媒介,其弱关系的属性能够更好地跨地域连接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潜在的支持者,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动员的成本,使参与变得“个人化”,而非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和政党。即“使用社交媒体不仅能够使动员号召变得更加广泛,而且使这些动员能够为更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和外部观察家所知晓”。<sup>[30]</sup>纵观“阿拉伯之春”中一些国家政权的更迭,大多离不开社交媒体这个平台对这些国家年轻人的集聚和鼓动。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消息通过新媒体传播,引发了反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成功地迫使总统本·阿里放弃自己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而紧接4周后,被突尼斯革命的成功而鼓舞的埃及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据英国BBC给出的数量,当时参加抗议穆尔西的人数达到3300万之多。

尤其是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络实现了高度联结,并能够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维持关系,以及协调行动和相互支持。这种情形犹如革命者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使用Facebook来安排抗议,使用Twitter来进行协调,使用YouTube来告知世界。”<sup>[31]</sup>在埃及革命中,社交网络力量最终促成了穆巴拉克独裁政权的被推翻。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动员作用,革命就不可能这么快速地得以蔓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在得到消息后走上街头。可见,社交媒体在政治发起、舆论宣传、网络鼓动、群体协商、情绪串联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担任战术动员、沟通和协调的工具,也是国内和国际革命蔓延的工具。”<sup>[32]</sup>

## (三) 强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诉求, 引发社会政治意愿的“共振效应”

媒体与身份认同关系密切。身份认同主要是指个人和社会的认同,是权力政治的表征和产物。中心与边缘、压制与抵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相应地带来身份认同的变化。而媒体是现实和认知结果之间的桥梁,它能够以价值观、政治观、社会问题、集体记忆等为传播内容,通过信息采集、思想影响、政治动员等途径,来塑造事物形象和构建关系网络,从而影响人们的情感、思想意识和身份认同。在埃及革命中,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共同创作、自我组织、开放资源和心声的平台,这个平台催生、引发、强化了阿拉伯青年群体的“共同体”身份意识。这种“共同体”背后是他们共同的境遇和共同的政治诉求。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但阿拉伯人民有共同的坏回忆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梦想。”<sup>[33]</sup>

“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在塑造与加强受众的角色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社交媒体的聚集和勾连能力的充分展现,青年人通过社交媒体寻求身份认同的现象日益明显,权利意识也开始觉醒并得以加强。在社交媒体形成的生活共同体中,他们在同政府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找到了价值存在感和团体归属感。例如,在埃及,他们通过在Facebook上创建“我们都是哈立德”的阿拉伯语网页,“通过情感体验来团结人群”,<sup>[34]</sup>实现了青年聚集,并在高度互动与分享的过程中强化了共同感和归属感,青年的个体感受随之被整合为共同意识。社交媒体这种“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自组织平台,为这种追求个性和自由而又高度离散的和自主的青年人提供了独特的群体聚合平台,当这种自组织和共同的政治映像相结合时,青年抗议运动便发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强烈的泛阿拉伯意识也是这次青年群体革命的典型特征。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特点。可以说“阿拉伯地区的集体认同部分是建立在排斥全球化和西化基



础上的,这有助于形成新的‘反帝团结’,造成一个‘更广泛的元邦阿拉伯主义’”。<sup>[35]</sup>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至少有81%的阿拉伯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来自共同的威胁,75%的受访者赞成采取联合的方式来支持阿拉伯团结。可以说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挑战使阿拉伯青年高呼同一个口号,表达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欲望。而事实上,除了地理政治文化因素外,社交媒体“在该地区形成了很强的跨国认同意识”和“越来越有凝聚力的阿拉伯意识”,并且关键的是,社交媒体“作为加强泛阿拉伯的一种手段意识,反过来成为危机蔓延的肥沃土壤”。<sup>[36]</sup>

### 三、“阿拉伯之春”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的启示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sup>[37]</sup>近年来,震撼世界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用事实说明了青年群体是最不稳定、最活跃、最具有个性的特殊群体。今天,在我国各类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有青年群体的参与。尤其是在Weg 2.0时代,社交媒体给青年的思想观念和集体行为带来了更大的变量,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面对当前形势,借鉴“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对于做好社交媒体时代的我国青年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 重视网络社交媒体对青年的影响,引导青年有序政治参与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正成为数字高度连接的一代。“世界各地,有着大量的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青年人在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从事政治活动。例如,成立在线政治团体、传播政治博客,转发或者和朋友分享政治视频,以此来扩大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声音。”<sup>[38]</sup>在我国,有着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而青年人更是其使用主体。据调查,90.6%的青少年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微博、微信、陌陌、米聊等社交媒体特有的传播特征高度契合了青少年的心理特质,因而深受他们的喜爱,并已成为我国青年群体用于获取知识、彰显个性、休闲娱乐、共享状态的平台。但是,社交媒体在给青年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给青年自身和社会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和隐忧。尤其是在社会参与方面,社交媒体一方面促进了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及构建,对推动青年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给青年带来误导,对他们的认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给政治参与带来无序,一些青年参与行为甚至异化为街头政治。

社交媒体完全是一个虚拟社会,言论的自由和身份的隐匿,加之约束和监督的缺乏,使社交媒体很容易成为“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sup>[39]</sup>给网络虚拟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网民在群体中很容易受他人感染,变得极端、盲目,丧失理性,暴露出“乌合之众”的本质。如果说“参与盲从”是由于青年辨识信息能力不足所致的话,那么参与极端化和丧失理性则是由于青年道德文化的缺失和青年权利诉求的反弹所导致的。面对这种情况,必须进行疏导与规制:一是完善社交媒体信息渠道建设,以畅通青年的政治表达和诉求的渠道,让青年的不满情绪能够及时“开闸泄洪”,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交媒体参与制度和危机传播策略,消除社会发展中噪音和杂音,防止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三是改善青年心理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土壤,使青年参与心理和参与行为趋于理性、平和、客观;四是熟知青年参与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有策略地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控制,培育青年参与公共事件的健康心理,使其养成较好的参与习惯和文化自觉。

#### (二) 畅通青年诉求表达渠道,着力解决青年中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现代化,我国青年群体的权利意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and 广阔的发展空间。当代中国青年权利意识的生长,在于我国市场化的进程、全球化生存方式,以及网络化交往。尤其是网络化的交往,进一步拓展了公共领域的空间,搭建了青年群体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广阔平台,为权利意识的勃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而,社交媒体政治参与负载着青年群体利益诉求,也寄托着实现公权力的渴望。当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渠道受阻,言论表达受到压制的时候,青年群体的不满情绪和攻击性言论、反体制言论很容易以报复性反弹的方式在社交媒体空间进行传播和扩散开来。因而,在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政治潮流的今天,面对青年群体参与意识的觉醒,一个明智的政府只有摒弃管制理念和官本位理念,提升制度容纳能力,保护和支持青年群体合法政治参与的权利,积极扩大和畅通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渠道,加强互动,才能够构建与青年群体良好的关系,才能获得广泛的执政认同和巩固执政基础。

党和政府部门必须关注青年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尽管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依然存在腐败现象严重、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容易引发青年的不满,当这些积怨达到的一定阶段时,就有可能演化成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事实证明,挑战体制的推动力往往来源于“游离于政治秩序边缘或处于政治秩序之外的人”。<sup>[40]</sup>党和政府除了加强政治生态建设,一如既往地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维护公权力良性运行之外,还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除此之外,还要特别重视青年群体所存在的就业问题、价值观问题、心理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等。这些问题很容易给青年群体造成被剥夺感、不公正感。因此,党和政府应重视青年群体发展问题,坚持青年发展优先战略,为其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环境,给予真正的关心和帮助。

### (三) 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和个性发展,加强对青年信仰价值观的社会引导

当今,青年的主体价值和社会的主流价值,以及政府的主导价值之间存在着价值取向相互交融而又彼此分离的客观事实。随着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共精神、平等精神的觉醒和提升,长期以来,那种过于强调集体主义而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青年群体的共鸣和认可。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自身蕴含的平等、开放、自由和个性等个人权利意识的元素外,它能够给青年群体带来全新的话语空间,形成多元的、互联的公共领域,弥补了青年群体价值融通渠道的缺失,加强了青年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渴望确立新的集体身份,获得社会认可。这种心理特征也导致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选择集体抗争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参与或政治参与。而无论是青年对权力部门“唱反调”式的对抗性参与、宣泄不满情绪的发泄式参与,还是娱乐化和消遣化的狂欢式参与、缺乏辨别能力的从众式的盲从性参与,它们都让现实中非理性和无序化在社交媒体上得以扩大化,为公共事件演变为恶性群体事件推波助澜,给社会秩序带来威胁。

如今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青年人由于自身的特质和处境,很容易为西方势力所影响和利用。在“阿拉伯之春”中,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国外组织就是利用青年人思想比较单纯、情绪容易冲动、心智不够成熟、思想激进等特点,来煽动革命,从而达到颠覆现有政权的目的。实际上,“阿拉伯之春”与美欧进行“民主输出”是紧密相关的。它们把青年人作为受众目标,利用社交媒体、图书文化杂志、人员交流、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宣扬信息自由,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对青年人进行洗脑和蛊惑,从而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党和政府必须重视青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发展处境,积极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青年,坚定其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在政治参与方面,要充分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培养青年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营造浓厚的参与氛围,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同时规范社交媒体领域秩序,将民主参与的理念植根于心,实现青年参与的规范化和有序化。

### 参考文献:

- [1][21] R. Raddawi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Arabs [M]. Springer, 2015: 221.
- [2][7] Gada Kadoda, Sondra Haleb. Contemporary youth movement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Sudan [J].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 La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2015(01): 215-236.
- [3][17] Michael Sakbani. The revolutions of the Arab Spring: are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at the gates? [J]. Contemporary Affairs, 2011(02): 127-147.
- [4] Matthew Costello, J. Craig Jenkins. Bread, Justice, or Opportunity?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rab Awakening Protest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5(67): 90-100.
- [5][29] Hisham M. Abdelsalam. Christopher G. Reddick. Social media in Egyptian government websites: Presence, usage, and effectiveness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30): 406-416.
- [6][19] Dina Kiwan.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the Arab Revolutions: Youth, Women, and Refugees [J]. Democracy and Security, 2015(02): 129-144.
- [8] Alan Steinberg. Exploring Web 2.0 political engagement: Is new technology reducing the bias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Electoral Studies, 2015(39): 102-116.
- [9] Ashraf M. Attia, Nergis Aziz. Commentary: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ing tools on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s "Revolution 2.0" [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1(10): 369–374.

[10][12][18][23][38] Bassem E. Maamari, Hala El Zein.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the Youth in Lebanon at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4(04): 496–505.

[11] Marija Anna Bekafigo, Allan McBride. Who Tweets About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witter Users During the 2011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3(05): 625–643.

[13][14]Imad Salamey. Post-Arab Spring: changes and challenges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5(01): 111–129.

[15]Mervat F. Hatem. The Arab Spring Meets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Examples of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Citizenship in a Global World [J].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2012(08): 398–403.

[16]Jasmine Lorenzini.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Youth [J]. J Happiness Stud, 2015(16): 381–404.

[20][22][31][32][35][36]Theodor Tudoroiu. Social Media and 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ase of the Arab Spring [J].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14(03): 346–365.

[24][25]Ralf Klischewski. When virtual reality meets realpolitik: Social media shaping the Arab government–citizen relationship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4, 31: 358–364.

[26] 本·H. 贝戈蒂克安. 媒体垄断 [M]. 吴靖译. 石家庄: 教育出版社, 2004: 43.

[27][34]Yeslam Al-Saggaf, Peter Simmons. Social media in Saudi Arabia: Exploring its use during two natural disaster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5(95): 3–15.

[28]Marika Steenkamp, Nathalie Hyde-Clarke. The use of Facebook for political commentary in South Africa [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4(31): 91–97.

[33]S. Banerjee et al. (eds.). Chaos Theory in Politics,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 [M]. Springer, 2014: 37.

[37]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张立平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20.

[39] 埃瑟·戴森. 2.0 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M]. 胡泳等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17.

[40]J. Craig Jenkin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M]. Minner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15.

## The Youth' s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Arab Spring

Chen Wensheng

(Institute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at has sprung up in the world by the Arab Spring of 2011 remains influence.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on 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the campaign,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Arab youth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media for their linkages and mobilization functions and have altered the organizational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y became the campaign sponsors, promoters and main participators. At present, the Chinese society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transform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are intricate, and various group incidents involving young people happen frequently, which seriously test the 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the Arab Spring, actively expand the reasonable channels for the expression of young people' s demands, guide their orderly participation, which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the political risks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and realiz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the Arab Spring Youth; Youth;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Social Movement

责任编辑 曾燕波